

DUKU

读库

1203

DUKU

读
库

1203

主编 张立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1203/张立宪主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33-0769-7

I. ①读… II. ①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IV. 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12) 第139459号

读库1203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83398809

官方网站: www.duku.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5mm × 925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69-7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57	一辈子的战争	刘青松
58-86	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	云从龙
87-124	旅美三学者	李怀宇
125-164	弟弟王小波	王小平
165-182	蒋经国上海打虎	李 辉
183-198	越轨的笔致	蔡小容
199-287	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	刘 柠
288-317	德国的世纪诉讼	周 翠

一辈子的战争

刘青松

“你如果无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残酷的真相告诉世界。”

七连荣誉室，灯光炫目。面对墙上十六位烈士的照片，李玉谦双手合十，举过头顶，身体前倾，仆倒在地，行五体投地大礼，三遍。

燃一炷香，青烟袅袅。李玉谦含泪与烈士们对望，喃喃道：“我能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里。”

陪同的军官请李玉谦题词。李玉谦挥毫写下：死一人，卫一国。千秋社稷，亡者几多，共祭之。

我们一行乘车去食堂。一路都是士兵们训练的呐喊声。操场上立着大字标语：枕戈待旦，准备打仗。

食堂包间，一桌冷菜和空瓶。酒酣耳热。李玉谦举杯：“今天是2012年3月30日，清明快到了，我有两个祈愿：一是祈愿世界和平，二

是祈愿人类免除灾难。”

李玉谦想起了二十七年前的那场酒。1985年11月25日晚，云南老山主峰脚下的磨刀石，战斗前七连各班的出征酒。二十七年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于那场酒，那群人，那次战斗，那场战争，李玉谦有意回避。他从不看战争片、战争小说，从不跟七连的人联系。他希望忘了那一切。

1985年，李玉谦二十三岁，是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的记者。十六岁高中毕业那年，他虚报两岁，在家乡山东莒县报名参军。入伍不久，他考上军校，学新闻。毕业后分配到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开始自学电视摄像。他爱读书，爱钻研，不爱说话。这个文学青年，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孤苦者”。“我背负着苦的重载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我的每一个脚印都将蓄满泪水。”他在战地日记里写道：“我的内心很复杂，我被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情折磨着，我在积蓄自身的力，我在呼唤缪斯的临降，我要歌颂威武的英雄。”

这一年，中越边境防御作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

1985年3月12日，山东淄博周村火车站，参加轮战的济南军区某部七连官兵，准备登上一辆开往前线的闷罐列车。这个连队名头很响——1947年国内战争期间的河北正定攻城战，七连首先登上城头，立集体一等功，荣获“登城先锋连”称号；1949年开国大典，七连是从天安门广场走过的第一个步兵方队；历年的军事训练，七连都在全军名列前茅，被树为全军标兵连队。

火车站人山人海，老乡们敲锣打鼓来送行。十八岁的回族小伙子马军入伍才一个多月，轮战命令下来，本应进行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提前结束。在他看来，这是脱离苦海，不用每天再为训练受罪了。和绝大多数战友一样，马军没告诉父母自己要去打仗。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后来，到了前线，部队给每个战士家里发了一封信，父母才知道。他当时不知道，妈妈开始夜夜失眠，身体垮了，落下病根。

副连长张长岭的妈妈也是夜夜失眠，一年间，头发全白了。原本不信神的妈妈，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到马路上烧纸拜神求保佑。后来

张长岭从前线平安回家，妈妈把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

置身送行的人群中，大家唱起了《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

二十一岁的孙卓诗唱不下去，和来送行的当过兵的大哥抱头痛哭。

一位战士跪在送行的父母面前，哽咽着说：“爹、娘，也许孩儿再也不能孝敬你们，无法报答养育之恩，望你们多加保重。请放心，我是不会给家人丢脸的。”说完，连磕三个响头，起身登上列车，不再回头。

连指导员展奎华的爱人挺着大肚子，紧紧握着丈夫的手，两眼红肿，一言不发。“回去吧，让我们的爱情经受战火考验。”展奎华轻声说。汽笛鸣响，妻子从挎包里取出一双绣花鞋垫，放到展奎华手上：“愿它能保佑你平安凯旋。你带着它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人群中，一个战士喊道：“嫂子放心，我们会把指导员完好地交还给你的。”

闷罐列车缓缓开动。二十岁的老兵陶世德心慢慢沉下来。他羡慕那些出征前能和亲人见上一面的战友。他当兵四年了，出征前，本想回家探亲，但连队规定不允许。他思绪翻滚：“为什么要告别呢？我要活着回来，我要立功回来。”

闷罐车厢里黑咕隆咚，每节车厢吊一盏马灯。地板铺着干草，作为床铺。在这局促空间里，战士们每天还要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休息的时候，人人沉默。车声隆隆。

车迂回向南，走得很慢。走了十来天，到达云南广通车站。广通中学的女学生们来送水慰问。一个女孩子来到担任警戒任务的陶世德面前，请他在笔记本上签名留念。陶世德激动得有点不知所措。他觉得，签名是大人物和名人的事，“我只知道中国女排拿了世界冠军，上春节晚会时在一个排球上签名。我有资格给人签名吗？”他想了想，写道：“战士的爱是蓝色的，他来自于天一样的气质和海一样的品格。”

后来，陶世德得到了另一个女学生的爱。在前线，他收到家乡安徽安庆女学生周绍怡写给前线战士的信，和她建立了书信往来，一来二去，互生情愫。不幸的是，陶世德在阵地上触雷，全身负伤六十余处，左手、左腿炸断，左眼失明，成了特等残疾。周绍怡没有退缩，不顾父母反对，从家里偷出户口本，和陶世德去领了结婚证。两人的婚后生活很幸福。

如今，想念战友的时候，陶世德就用笛子吹一曲当年流行的《小草》，女儿用电子琴给他伴奏。女儿正是当年那个找他签名的中学生的年纪，不大清楚父亲当年打仗的事，她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喜欢找明星签名。

这一年，李玉谦去前线，缘于拍摄明星。1985年9月底，因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全国走红的青年歌手彭丽媛，随总政歌舞团去老山前线慰问演出，李玉谦应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之命，前往拍摄《彭丽媛在老山》的纪录片。之前，他刚刚拍完以中越战争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闻名的作家李存葆的专题片，拍完发起开展“战士在我心中”活动的八名山东大学女生的新闻，拍完参战部队齐声高唱“同志们英勇顽强奔赴祖国的战场”的出征场面。

彭丽媛离开前线时，已完成任务的李玉谦却留了下来。他一直没告诉父母自己到了前线，而是把家信先寄到北京的姨妈那里，让姨妈换个信封再寄往他家。他去采访各部队，穿过炮火封锁区时，心里特别恐惧。他拍摄专程到前线用一次成像相机为每个战士免费拍照的北京个体户沈乃华、陈银凤，拍摄在两口子衣服上签名的战士们，“每天都有泪流下来”。他在战地日记里抒发“孤苦者”感怀的同时，自认“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感受一天比一天深，感情一天比一天强烈，思想也一天比一天充实，内心里迸发出一种奋进的力量、勇敢的精神。”他决心“完成一个艰难的转折——由风花雪月到金戈铁马”。他给混熟的战士讲荤段子，跟战士学跳迪斯科，他改写的《帐篷迪斯科》歌词，在战士们中间传开：“没有高耸的楼，没有迷人的妞，我们在帐篷里，跳一支迪斯科……”

2012年3月，李玉谦带领纪录片《我的兄弟连》摄制组来到山东济宁。老战友聊得热闹的饭桌上，他不时沉默。别人敬酒，他一口干掉杯中酒。

王世泉也比较沉默。他在一家制药厂的车间里干活，月工资一千多。为了贴补家用，工余时间他去开黑车。他把儿子也送到了部队。儿子退伍三年，一直没安排工作，只好去打工，每月拿一千元。

一阵军号声，从王世泉的手机里传出。他接完电话，有人问起这军号声，他说，是起床号。坐他旁边的战友高俊忠叫人拨响自己的手机，同样军号嘹亮。高俊忠说，我这是吃饭号。

王世泉拨弄了几下，手机传出旋律，柔美的女声，是当年流行的《风雨兼程》：“今天你又去远行，正是风雨浓，山高水长路不平，愿你多保重。记得那年初相识，也在风雨中，风浓雨浓情更浓，祝你早成功……还是常言说得好，风光在险峰，待到雨过天晴时，捷报化彩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王世泉两眼放光：“当年，去前线的闷罐车里，我一遍又一遍听录音机里放这首歌，听了一路。”

闷罐列车开到昆明后，七连官兵转乘汽车到文山县巴布镇，在那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临战训练。

七连的训练苦是出名的。除了挖工事、射击、潜伏训练，战士们每天都要负重越野，翻越十几座山。陶世德记得，“一趟下来，全身只有扣子和钢盔是干的，衣服全湿透了，晚上双腿都抬不上床”。对那些训练表现不好的战士，连长张凤洋让他们坐在蚂蚁窝上，任蚂蚁在身上乱爬也不能动，一动，张凤洋举棍就打。

七连的霸气也是出名的。露天电影开演前，各连队唱歌，七连的战士们不是在唱，是扯开喉咙在吼，把其他连队的歌声全比下去了。看电影，其他连队坐着看，七连的人蹲着看，上身笔直，一动不动。张凤洋有时还会别出心裁安排一些特殊训练：偷老乡的狗，偷老乡的地瓜，有一次甚至去偷八连用来糊窗的泥巴，被八连的人发现了，差点打群架。

对战士们来说，临战训练虽苦，却如置身世外桃源。老山在远处，战争似乎还很遥远。

1985年5月15日，连指导员展奎华、排长孙兆群带领陆永仁、李秀群、陶世德等几位班长上老山前沿阵地熟悉地形。

汽车驶近，云雾缭绕的老山在大家视野中逐渐清晰。这座主峰海拔1422.2米的大山，山形险要，森林覆盖，草棘丛生，战壕、暗堡和坑道纵横。中国军队的给养、弹药，都要靠军工背上阵地，坡陡路滑，地雷密布，有些路段直接暴露在越军火力覆盖下，军工们步步艰险，常有人倒下。

七连将要接防43号、45号、1073高地等五个阵地，二十岁的陆永仁一马当先，在一个钟头内走了一遍。陆永仁是全连公认的军事技术尖子。在孙兆群印象中，这是一个“很热情，很好的孩子”。

回到驻地，大家为一周后带战士们上阵地作准备。闲暇时，李秀群用扑克牌给陆永仁算命，算完一惊：“你呀，命不好。”陆永仁大大咧咧地说：“大不了牺牲呗。要是我牺牲，那就在全连排个第一。”

5月22日，七连官兵在大雾中登上老山，进入前沿阵地。副班长赵富新一点也不紧张，和战友们有说有笑。二十七年后，他说：“那时候对战争无知。”

陆永仁领着班里的战士沿通路前往1073高地。所谓通路，其实是一条不足四十厘米宽的小路，已经先由工兵排过雷。这天，小路上坑坑洼洼，全是泥浆，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挪脚。

陆永仁穿一双新的高筒解放鞋，他很仔细地 looking 脚下，怕新鞋被弄得太脏。走到一个较大的泥浆坑前，他犹豫了一下。要趟过去，鞋子肯定变成泥鞋。他往通路边沿看看，那个地方比较干。他抬起右脚，往通路边沿踩上去。只是，脚不小心滑出去了一点，按孙兆群的说法，“滑出去不到一个火柴盒的距离”，一声闷响，硝烟腾起，他惨叫一声，倒下了。后面的战士扶起他，看到他的右脚及三分之一的小腿不见了，伤口像烤焦的熟肉。

进入阵地的头几天，上面发下来红烧猪肉罐头，李福启一看到罐

头里的肉，就想起班长陆永仁血肉模糊的伤腿，怎么也吃不下。班里其他人也一样。战友们向上面反映，别再发红烧肉罐头了。上面改发了水果罐头。

陆永仁被人背到孙兆群面前时，眼睛瞪得老大：“排长，仗我还没打呢，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干了。”

孙兆群安排十六个人用担架把陆永仁往前线医疗所运送。上坡路，坡太陡，路太滑，还得防着地雷，十六个人抬着担架，前面的人跪着往前挪，后面的人用力举送，每前进一米都拼了老命。从陆永仁负伤的位置到老山主峰，直线距离不超过一公里，三个半小时还没有到。最后抬到前线医疗所的时候，超过了八个小时。因流血过多，陆永仁牺牲在运送的通路上。

仗还没开打，陆永仁成为七连第一位烈士。

“陆永仁的牺牲，一下子就把我们打醒了。战争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它是要吃人的。”2009年，面对李玉谦的摄像机镜头，孙兆群说。说到陆永仁冲自己喊“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干了”，他说不下去了，连说“对不起，心情不好”。

“雨。今天是我们来到阵地后的第二天。我们班在老山主峰前42号高地上，高地周围没有战壕，上下一线设有三个哨位，我和另外一名新同志在高地顶端的反斜面猫耳洞里，哨位三面受敌，哨位周围包括上下通路两边，都埋有各种地雷，据先前守卫人员说，该高地总共有地雷一万颗。”1985年5月23日，赵富新在日记里写道。

高地上的地雷，交战双方都留了很多。六〇炮班的高奎看到，猫耳洞前，战友们把成箱的地雷往下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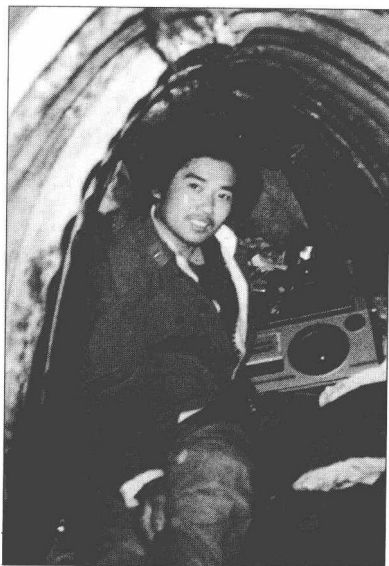
处处是地雷，猫耳洞就成了汪洋中的一条船。这种在土坡侧壁挖掘而成的栖身洞穴很小，一般只能容纳两三人，站不直，躺不下。战士们窝在洞里，顶上渗水，不时有土块掉下来。

越军的阵地就在几十米外，那边的人掰个竹条往嘴里扒饭，这边都能看清那竹条上有几个丫巴。一个手榴弹就能扔过去。山形所致，敌我双方阵地犬牙交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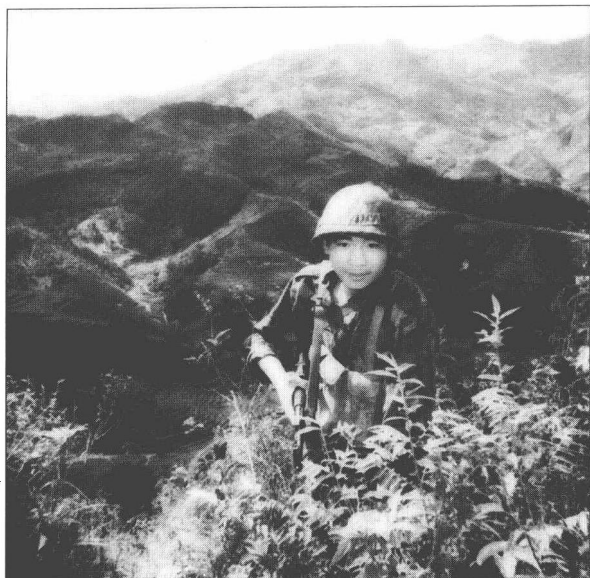
在哨位上，必须高度警惕，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观察敌情。白



马军在猫耳洞。猫耳洞是老山前线一种最普通的战地掩蔽工事，通常构筑在堑壕或者交通壕的两侧，拱形的半圆门，高约一米，宽几十厘米，纵深不等，小则仅供一人容身，大则可纳三五人。



田敬福在猫耳洞里。他身边的卡式录音机在当时是年轻人的宝贝，能拥有一台，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一等功臣田敬福现在东北一家砖窑打工。



高俊忠在老山脚下磨刀石战前训练时的留影。这张照片由北京佳乐餐厅夫妻经理沈乃华、陈银凤用一次成像照相机拍摄。夫妻俩为前线战士们拍摄了上千张照片，很多战士把照片珍藏至今。



马军（左一）和战友们在前沿阵地合影。他们身后的大树，树冠、树枝都被炮弹炸掉了，只剩下一截树干，在前沿阵地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景象。

天还好，夜里就难了，特别是上级规定：夜间必须两人站哨。

夜里，孔凡超和瞿传武各自手持冲锋枪坐在哨位上，背靠背，瞪着阵地前的树丛。没有一丝动静。瞪了一会儿，孔凡超眼皮打架，脑袋往下点，抬起来，又往下点。点了一阵，猛然惊醒，但觉一梭子弹擦着头皮飞过。他回头一看，是战友的枪口，战友闭着眼，头歪到一边。他拍醒瞿传武：“喂，你把枪的保险关上，我的也关上。”然后用枪托打他，“可把我气坏了，要是往这边歪头，那不是正好中三枪”。

5月26日，越军开始向我方阵地发动进攻。先是小股步兵摸到阵地前，被我方炮火打退。撤退后，又过来。战士们为了不暴露目标，纷纷向敌人扔手榴弹。二十二岁的孙彦杰摸出一枚手榴弹，拉了引信，高举起来，手抖个不停，冲哨位前面的几个敌人哈哈大笑，噓噓作响的手榴弹一直攥在手里。旁边的哨长冲他喊：“快扔！快扔！”孙彦杰一哆嗦，扔出手榴弹，扔得离自己不远，炸了。哨长一脚把他蹬到猫耳洞里，举起冲锋枪就打。几个敌人跑掉了。孙彦杰一直哈哈大笑。

退伍后，孙彦杰进了化工厂，常有幻觉，把机器轰鸣声当成枪炮声，总看见别人举枪追杀自己。他床头摆着菜刀，“敌人”一来，就挥刀乱砍，砍得墙上满是刀痕。家人不敢和他住一间屋子。女儿十二岁时出了车祸，高位截瘫。他长年在外流浪，如孤魂野鬼。孙兆群去看他，老远看到他在村头晃荡。已不认识家人的孙彦杰，一眼就认出了老领导，抱住孙兆群痛哭流涕。

打起仗来，孙彦杰的战友们也害怕，有人腿软，有人尿裤子，有人一紧张就想睡觉。不过，他们明白，没有退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第一次在战场上杀人，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犹豫。“是本能，也是训练的结果。”印义章说。

战斗打响后，印义章七天七夜没合眼。哨位上，枪声，炮声，手榴弹声，不绝于耳。他的双腿总是并拢。腿一分开，就会发抖。有的战友，白天在枪炮声里抱着机枪都能睡着。“太困，也太紧张了。”

战斗一打响，阵地和阵地之间被越军用炮火封锁，伤员抬不下去，弹药和粮食也送不上来。弹药可以节约点用，没吃的，只能硬撑。孙兆群饿了五夜六天。“过去老人讲，饿了眼前冒金星。是啊，刚开始还有金星星，到后几天，金星星都没有了。蹲着，一站起来，眼前乌黑乌黑的，胃很热很热。”

最糟糕的是，水源也被越军控制了。大家只能把布隔在泥浆水上，用消毒管吸点水。水里全是火药味、血腥味、尸臭味。“我现在胃不好，就是当时喝尸臭水害的。”孙兆群说。

好在那些天偶尔下点雨，战士们可以用钢盔接点雨水喝。水喝下去，胃一下就清凉了。

连天激战，赵富新所在阵地周围的树被炸得只剩了树干。他学会了扔手榴弹往上扔，因为往前扔，有可能会被树枝挡回来。他也学会了辨别飞来炮弹的危险程度：“呜呜”响的，不用太担心，它会落在百米开外；听到“扑哧”一声，要赶紧卧倒，它就冲你跟前来了。

大家渐渐摸着了规律——怕静不怕动。炮火最凶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要是静悄悄的，就不敢睡，怕敌人摸上来，怕当俘虏。”马军说。

马军负伤了。一枚手榴弹爆炸，几块弹片扎进了他左臀。他摸到一片，咬牙硬抠了出来。军医取出了另一片。马军感觉没事了，没包扎，也没下阵地。有战友说：“你是钢腚吧。”后来他才知道，屁股里还有第三块弹片。

七天后，马军再次负伤，弹片打入左胸口。“还差零点五公分，胸腔就打透了。如果透了就形成气胸，基本没法救。”从阵地到前线医疗所，一公里多点，马军走了八个小时，血流了一路。“炮弹在头上飞，坡很陡很滑。一开始说抬，我一看，被人抬更慢，还不如自己跑，不然炮弹来了谁也躲不了。”

越军炮轰，孔凡超被炸懵了，起身提着印义章的冲锋枪问他：“我的枪呢？”结果，提枪的手被炸掉一根手指。

5月29日，三排长陈菊生中炮牺牲。王振亮亲眼看到，“他就那么被掀到空中了，像个风筝一样”。

5月30日，越军大炮猛轰七连阵地，敌人形成包围之势。

连长张凤洋下令：各阵地要独自坚守，上级无法支援，没有命令，不准后撤。每个人准备一枚“光荣弹”，系在身上，决不允许做俘虏。关键时刻，党员、骨干要发挥作用，用实际行动捍卫前辈给七连留下的荣誉，为七连再立新功。

5月31日，敌人发动近几天来最猛烈的攻势。战士们杀红了眼。后来，七连官兵把这段延续十多天的战斗称为“五·三一”大战。

“五·三一”大战，七连牺牲三人，很多人轻伤不下火线，没有丢掉一个哨位。

炮火洗礼了一个个稚气未脱的小伙子，一夜间，他们长大成人。陶世德原本胆小，新兵训练时，一听枪响就闭眼，身子一抖。战友们笑他，专门在他旁边打枪。后来，他的枪法练得很准。“五·三一”大战，他率领班里的战友打退越军数十次进攻，立集体一等功。

炮火中，大家并肩作战，并肩担起战友的生命。

5月31日，周兵在日记里写道：“整整四十八小时什么都没吃，饥饿、寒冷、虚弱，一起向我们袭来。……渴，渴呀——一天激战，体力大量消耗，如今，最需要的是水，可是谁也没有喝，将这珍贵的水留着吧！”

6月7日之后，硝烟渐渐散去。山间鸟鸣，云雾环绕，宛如仙境。

“坐在晚霞下看着对面的村庄，是那样的安静。没有战争该有多好啊！”陶世德感慨。他观察到，越军占据的968高地常有妇女和小孩去送粮食、弹药，好几次他想举枪，却把手收了回来。“扳机扣下去很简单，但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们的家人也等着我们回去，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在一部我军的内部资料片里，缴获的越军照片作为战果展示。照片贴在墙上，镜头一一掠过那些年轻的脸庞。一样的帅气，一样的满怀憧憬。照片里有恋人，还有母亲。

雨季来了，战壕和通道里，水齐膝深。血水、尸水和泥水混合在一起，气味难闻。由于太潮湿，皮肤极易溃烂，穿衣服一揭，肉都会

带起来。很多战士裆部和脚都溃烂了，穿不住衣服，只能赤条条，戏称打的是“裸体战争”。

没法洗澡。身上痒得难受时，用沙子擦擦身。

阵地前雷区内有越军的残肢，爬满蛆虫苍蝇。山蚂蝗又黑又粗，叮进人肉里，很难拔出来，只有用烟头烫它，才滚下来。大蚊子一叮在身上，就起红水泡。

马军记得前线流传的“云南四大怪”顺口溜，其中一句是：“三个老鼠一麻袋，四个蚊子一盘菜。”在猫耳洞里睡觉，有时会疼醒，一看，老鼠在咬脚趾头，咬出血来。大米里，老鼠屎似乎比米粒还多，吃上几筷子就有一坨。刚开始不习惯，不吃了，饿一顿；后来，老鼠屎吃到嘴里，吐出去，接着吃。

在哨位上做饭，是不能有炊烟冒出来的，怕被敌人发现方位，打冷枪。只能趁着大雾天气做饭。没雾时，就吃压缩饼干和罐头。“有时正吃着饭，炸起来的碎尸，手什么的，能蹦进碗里。”马军的回族老乡高俊忠说。

高俊忠在七连里年龄最小，当时刚满十七岁。他喜欢和只比他大半岁的顾克路一起打沙袋，比拳脚。他佩服顾克路脑袋瓜灵。顾克路想出个点子，在哨位上挖了七八条烟道，做饭时，炊烟同时从七八条烟道散出去，敌人就辨不清方位。

大眼睛，双眼皮，爱笑，一笑就露出两个小酒窝，一对虎牙，顾克路的这个形象，在战友们记忆里鲜活如昨。孙兆群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顾克路，是1984年11月24日。那天，他到火车站去接新兵，暗中挑些顺眼的孩子。他一看到顾克路的那对虎牙就乐了，问他：“你今年年纪多大了？”顾克路说：“我十八了。”孙兆群心想这小家伙怎么看也不到十八岁，就问：“什么文化程度啊？”“初中毕业。”“毕业几年了？”“刚毕业。”孙兆群想，还是小啊，根本就没有心计，一说就露馅了，初中刚毕业，哪有十八岁的？他又问：“你在家会干什么？”“我在家学木工。”“你会做什么啊？”“家里的门窗都是我做的。”“你有什么爱好？”“我爱好武术。”“会什么拳？”顾克路当场就给孙兆群打了一套拳，引来一堆人围观。孙